

學生姓名：譚曉琳

所選書名：張光直著，郭淨譯：《美術、神話與祭祀》，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於西方國家而言，東方的古代文明總像披著一層神秘面紗。研究者往往渴望探索中國古代的美術、神話與祭祀源頭，並從中了解早期人類社會的文化。我小時候常常思考到底祭祀和儀式是做給「天」看的，還是為了讓「人」自己感覺心安，所以創造出各種儀式來達到目的？長大後，我發現儘管世界各地的文化源流和信仰都不同，但總是存在著相似的洪水和創世神話。祭祀儀式也少不了用火、宰殺生靈作獻祭和舞蹈等元素，這箇中到底有何關聯，又這些「傳統」為什麼要讓後世牢牢記在心中呢？我開始思考「文化」並不止神話故事或儀式本身。誰創造了這些「文化」，因何創造反而是更重要的問題。這本書給了我不少解答。據譯者的話，作者利用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和神話學等各種材料，透過探尋中國文明起源的角度，思考中國文明在整個世界文明體系中的地位、價值和特徵。追源溯流，從夏、商、周王朝探討當時的政治權力如何透過「親族層序系統、統治者的道德權威、武裝力量、對神與祖先溝通的獨佔（如借助祭祀、藝術和文字運用等手段），以及對財富本身的獨佔」不斷演化。

書本首章〈氏族、城邑與政治景觀〉提及的感生神話、宗族世系和國與國之間的聯姻，皆反映了古代中國對「天」和「血緣親疏」概念的重視。作者指出夏、商、周三國只是該時代最顯赫的國家，卻絕不是當時唯一的國家。「儘管古代中國的數百個父系氏族都有自己的祖先誕生神話，但只有少數能建立起統治王朝和其他政治實體的氏族得以僥倖把這類神話保存下來。」兒時的我，對上古傳說、神話人物和《山海經》中光怪陸離的世界深信不疑，從未想過始祖誕生神話有可能是由統治者創造出來，且對家族譜系和穩固王朝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鯀禹治水、「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和姜嫄「履大人跡」生棄等耳熟能詳的故事成了氏族族人對統治者，以及整個民族認同感的來源。所謂「親疏有別」，作者指出「以血緣紐帶維繫其成員的社會集團，左右著政治權力，是中國古代國家最顯著的特徵」，而這種以血緣宗系決定政治地位的方式，在中國不同朝代的政策中亦顯而易見。古時，不同氏族以圖騰劃分自己的領域和器物，且與擁有其他圖騰的氏族聯姻，發展出「分佈著成百上千個為不同氏族和宗族所佔據的城邑，形成古代中國的政治景觀」。

然而，單靠以上所說的神話並不足以維持政治權威，統治者需「以德配天」。作者在第二章〈道德權威與強制力量〉中說明「每個氏族都宣稱自己是神的後裔，並為統治權而奮鬥」，這樣大家都變得有資格取得這種權利。因此，在周朝，「功」成為了基礎的價值評判，「生而具有治人的資格還不夠，還必須靠行動贏得被統治者的擁護，才能真正取得統治權」。確實，古代中國社會重視

「天人感應」，民眾因感生傳說而相信統治者有著和「天」溝通的能力，所以依靠統治者能通過祭祀保佑社稷，福佑蒼生。但即使商朝的始祖是「天命所歸」，紂王無道卻是言之鑿鑿的事實。這種情況下，民眾漸漸萌生出所謂「天命」可能也不是永恆的想法。「於是，政治王朝的覆沒是由於君王無道，失去統治的資格；新王朝的建立者推翻舊王朝，成就了功業，這是符合民眾心願的行動。」讀到這裡，我想到了中國傳統的災祥觀念。古人將災異和政治連在一起，這種災異學說對政令和自然災害的關係作出分析，他們相信「天」是有意志的，對君主能賞善罰惡，主導著人的禍福。例如旱災的出現是因為冤獄或君王失德所造成，而天降祥瑞則是對君王的表彰。這些災異觀念約束著當權者，故需透過守「禮」而成為有德的君主。關於禮制和祭祀，作者提出「祖廟、牌位和禮器有約束與警示的作用，並作為氏族凝聚的象徵，神話則賦予氏族徽章，以證明其存在的合理性。」這就解釋了神話的重要性，是為了時刻提醒著族人先祖的功德，使其信服。

對於夏、商、周三朝的形象，我總是能聯想到巫師在祭祀儀式中起舞和以甲骨占卜等與「神」溝通的畫面。書中的第三章〈巫覡與政治〉是我最感興趣的一章。作者提出，「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幫助與天相通。巫透過控制著溝通手段，才握有統治的知識，即權力。」故研究古代中國的學者得出結論：「帝王自己就是眾巫的首領」。帝王掌控著發佈「天意」的權力，「卜辭中記載商王握有唯一的預言權，還有商王舞蹈求雨和占夢的內容，證明商王就是巫師」。看到這裡，我就明白為什麼巫覡與政治是息息相關了。既然王能同時掌控傳遞「天意」和管治社會的權力，他就能借助詮釋災異祥瑞和卜辭來達到他的目的。第七章〈政治權威的崛起〉中就提到「卜骨表明巫覡溝通天地的活動，但在甲骨上刻記卜辭的行為，與其說是宗教性的，不如說是政治性的。」作者以西伯利亞的「薩滿」和中國古代的巫師作比對，認為兩者之間有著極為相似的功能。巫在祭祀鬼神中擔任「此岸」和「彼岸」聯繫的中介。在書中關於動物紋樣意義的論述中，就提出了商周藝術的「兩龍」現象。作者認為這與殷商的宗廟制度「昭穆」有關，「在王族被分為兩組的情況下，王室祖先在另一世界裡也應作相似的排列。當巫師為王室而往來於兩個世界之間時，必須兼顧到昭穆兩組。巫師乘「兩龍」的目的在於保持與人間現象相應的社會與政治平衡。」作者對古代中國君主和巫師的政治地位、商周文字和藝術作出十分全面的詮釋，又提供了不少史料作論證，讓我對商代的巫覡文化更感興趣。書中提及「商王會請祖先預言自己當夜或下周的吉凶，看他會不會生病，甚至會不會牙痛。」這種透過卜辭分析商王生活隱秘的方式，讓我在閱讀時忍俊不禁，未知商王若是得知自己的私生活，竟是透過刻在甲骨上的卜辭在後世面前盡現，會作何感想。

《美術、神話與祭祀》討論了古代中國統治者如何以獨佔藝術和文字等獲取權力的手段來樹立自己的權威。作者提供了大量例子和史料圖片，以深入淺出的方式進行論說。例如第四章〈藝術——攫取權力的手段〉中展示了商代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和《山海經》的動物形象，又加入西伯利亞楚克奇人繪製的儀式圖，讓人印象深刻。我一直認為古人在祭祀儀式中讓動物充當「犧牲」，純粹是為取悅上天，將他們認為最好的獻給「天」以換取國泰民安。然而，西伯利亞「薩滿」（巫師）的祭祀儀式卻反映了，他們的目的是要尋求「動物助手」的幫助。而「召喚薩滿動物伙伴最通行的辦法，是以這些動物作犧牲，使它們的精靈自軀體中解脫和昇華出來。」我曾讀過關於萬物有靈論的資料，原始社會將一切自然現象歸根於精靈或靈魂。故我能明白不只野獸和飛鳥，樹和泥土等在西伯利亞人和阿爾泰人中間亦被視為「充當助手的精靈」。作者又以商代藝術裝飾的動物紋樣為例，指出以動物作「巫師的助手」的說法在古代中國也出現了，動物是巫覡溝通天地的主要媒介。作者指出「對帶有動物紋樣的青銅禮器的佔有，也就意味著對知識和權力的控制」，故王室的青銅器鑄入了不少的動物紋樣。

此外，文字亦是古代中國政治權威攫取權力的手段之一。文字是文化和知識的載體。關於中國文字的起源，除倉頡造字的傳說外，在史前遺址的出土陶器上也能找到線索。在很多出土陶器上都能找到刻劃紋，它們都具有明顯的符號特徵。作者認為「無論商代還是史前的陶器符號，絕大多數都是家族、宗族、氏族或其分支的標記和族徽。雖然這些符號並非文字，但作為單個的符號，它們至少是中國最早文字的來源之一。」這本書為我解惑，也讓我理解中國文化箇中的意趣。讀過這本書，我希望去發掘更多與商代卜辭和動物紋樣相關的論文及著作，繼續探討文化與權力間的關係。